

AI 焦虑:DeepSeek 与 ChatGPT 技术竞速的存在论解读

沈守涛¹,胡大平^{1,2}

(1.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南京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DeepSeek、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在普遍提高社会生产力、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个体与社会层面催发了 AI 焦虑现象。当前,国内外对 AI 焦虑的研究缺少从存在论角度来透视其实质,因此,采用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方法分析 AI 焦虑不仅有利于澄清 AI 焦虑背后以非本真的“怕”与本真的“畏”为核心,以后现代性为表征的技术、生存、社会焦虑,更能在人与技术的关系方面有效揭示技术加速发展的技术、理性、生存悖逆,从而为突破这一悖逆开辟可能的道路。这条道路以辩证展开技术焦虑的矛盾结构为起点,以打破“技术狂热”与“虚无主义”的桎梏为基础,抵制“一”的逻辑和这种逻辑的外化,而以游牧的状态真实地生活在世,通过“反思”重新聆听存在的声音,在与技术共在、共存的基础上推动“人与技术共生”实现平衡、和谐,开显技术在本体根源和社会关系之上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所具有的解放力量——技术既是人类向存在投射意向的创造行为,也是存在通过技术向人类显现“在场”“本有”的通道;技术在变革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既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也为从“物的依赖关系”到“自由个性”的转变提供条件。

关键词:DeepSeek;ChatGPT;AI 焦虑;技术竞速;此在生存

无论是 ChatGPT、Sora 还是 DeepSeek、Manus 等人工智能技术产品,作为当今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的翘楚,其对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助推了“人类世”向“后人类世”的跨越。然而,任何事物都充满了矛盾二重性,人工智能技术在具备显性进步作用的同时,也在人的存在问题上潜藏着隐性的二元悖逆。当下的 AI 焦虑^[1]这一特殊的现象^①,恰好标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的、隐藏的“毒性”,并将“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作为现

代性的问题以“后现代性”的方式表现出来。针对这一现象,目前国内外学界考察了 AI 焦虑的形成机制、影响作用,但并未能从存在论角度揭示 AI 焦虑背后的本质结构,也没有深入展现“焦虑”作为此在在世之“情绪”所具有的积极的生存论意义。较之于将技术视为工具或客体的理论而言,对技术的存在论解读开启了审视技术的新视角,即从本体论的角度揭示技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对人类整体存在的影响,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使技术“自主化发展”具备了可能性。

引用本文:沈守涛,胡大平. AI 焦虑:DeepSeek 与 ChatGPT 技术竞速的存在论解读[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7(2): 21-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2XKS024);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一般项目(2025YB0356);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规课题(24CCG52)

作者简介:沈守涛(1996—),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E-mail:895868425@qq.com

^① AI 焦虑是指个体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针对自身可能被技术冲击、替代所产生的不安与紧张感,表现为对技术的恐惧和担忧,从而自我怀疑、否定自身在世的价值和意义。

这如同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对原子能技术的担忧一样,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同样具有一种普遍的、从根源上影响全体人类生存与命运的风险,而无关肤色、地区、社会形态的差别,这是人及人类社会所要面临的客观存在。因此,选取 DeepSeek 与 ChatGPT 这两大不同技术路线的主流大语言模型为对象,以二者引发的 AI 焦虑作为切口,研究隐藏在 AI 焦虑背后的技术焦虑以及由技术焦虑牵引出的一般技术异化问题,这不仅有利于正确展现人作为“此在”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时代的生存情态和现身形式的变化、揭示焦虑情绪的存在论价值,还能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技术风险为警示,在人与技术共在、共存的基础上重思重构“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释放技术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变革中应有的解放潜力。

一、情绪的领会:存在论视域下的 AI 焦虑

自 2020 年 Open AI 发布 ChatGPT3.0 以来,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 10 个主要版本的迭代^[2];自 2023 年 11 月深度求索公司推出 DeepSeek Coder 后,DeepSeek 已历经 9 个版本的重点更新^[3]以及多次子版本迭代^[4]。二者的技术更新周期目前接近每月一次,知识图谱的更新速度约为每天一次。由此可以发现,ChatGPT、DeepSeek 等人工智能技术遵循类似“摩尔定律”的指数级发展,并且各自还以技术竞速的形式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博弈与国家竞争。而与技术的加速发展相比,人,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知识、技能的增长,都遵循着渐进累

积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差别导致技术与人之间存在一个客观的发展速率差,即人类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技术。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个体的认知将持续处于应激状态,在实际生存和自身价值意义的实现上产生严重的不安和不确定感,即 AI 焦虑。AI 焦虑作为人之为主体的内部情绪,其有着完整的内部结构(图 1)。

由图 1 可知,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的压力,AI 焦虑作为个体对技术压力的直接反应,以一种情绪的方式在主体自身内部表达出来。而 AI 焦虑背后,则是由技术焦虑主导,并由技术焦虑牵引出生存焦虑和社会焦虑。技术焦虑、生存焦虑和社会焦虑此三者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每一个在世生活的人的具体生存,并按照递进的方式依次展开。其中,AI 焦虑的实质在于对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的恐惧:技术是照亮人的火炬,还是统治人的枷锁?尤其是在这种技术不确定性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技术自主化”命题的现实化展开,对“技术自主化发展”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了人对“技术替代人”的焦虑情绪。而正是在技术对人进行替代的可能性下,技术焦虑展开了人被抛在世的生存焦虑和社会焦虑。

一是从生存焦虑来看,技术对人的替代性既涉及对人的现实性代替,也关乎对人作为此在的存在性颠覆。一方面,技术对人的现实性代替作为实际性的生存焦虑,关乎个体就业、隐私安全、数据主权、贫富分化等现实问题,具体以学历贬值、劳动替代、行业颠覆等消极形式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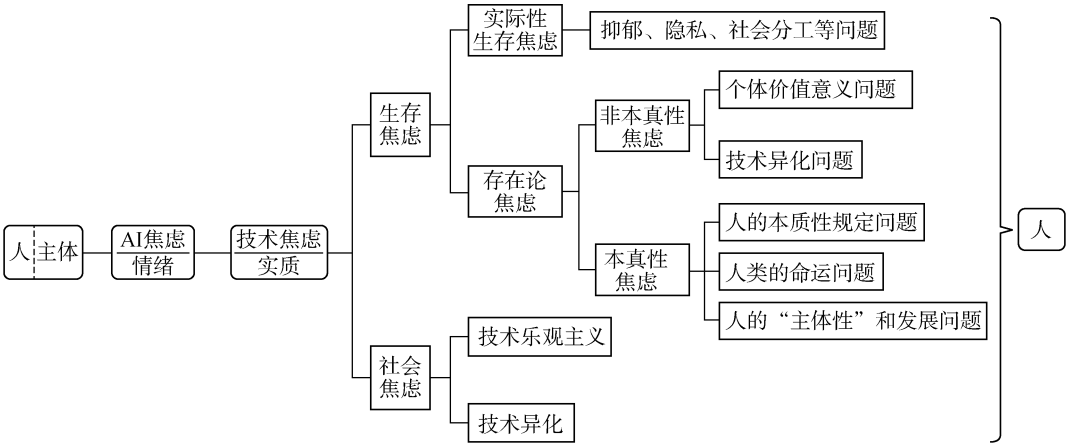


图 1 AI 焦虑的结构关系图谱

现。这是个体面对技术快速发展时,出于对技术的替补性选择和淘汰的忧虑,以及对技术侵入生活、威胁个体权利和利益的不安。另一方面,技术对人作为此在的存在性颠覆则表现为存在论焦虑。这种焦虑事关人作为此在在世的现身情态,其以“非本真焦虑”和“本真焦虑”组建着此在存在的显现。这种显现既由“非本真焦虑”牵引出个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意义的建构,也由“本真焦虑”带出由柏拉图肇始的、传统的“哲学三问”和“哲学三问”的变种:“我是谁?”“我从何处而来?”“我又往何处而去?”这三大问题在当今高技术飞速发展时代,转化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问题”“人类的命运问题”“人的主体性和发展问题”,时刻拷问着“人自身”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的构建。与此同时,对这三大问题的回应,一方面决定了现实的具体发展方向,筹划人与技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历史当下在场的具体样态和未来“尚未之物”在当下绽露的指引性,从而使“此之在”跨越时空限制保持双向的敞开性,完成历史和未来的“到时”在场,以历史总体性的方式串联起人类文明的持续性发展。因此,如果不能有效回答这 3 个问题,不仅在存在论上威胁着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存在,还将造成此在在存在、真理面前的“守护者”角色的失格^{[5]252-265}以及人类命运和前途的晦暗。

二是从社会焦虑来看,社会焦虑作为一种与生存焦虑并行的集体性情绪,来自技术的加速发展对社会原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击,改变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使人陷入技术发展的“进步”或“异化”的不确定性境地。伴随技术加速速率的持续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的狂飙突进,人类社会正加速向“技术奇点”靠近。而随着“技术奇点”的临近,技术自主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将决定技术带给人及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的 大小,这种不确定性从社会结构方面表现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异化。技术乐观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普遍的“乌托邦”理想,寄托了对技术进步作用的一种痴妄,幻想技术成为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这种乐观的“乌托邦”形式将资源有限性、社会发展、全

球环境治理等系统性问题的解决希望寄托于技术的加速发展,技术由此被赋予了“新的神性”,并企图通过与加速主义的合流使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尾随技术的加速发展而实现,这不仅凸显了对问题之当下的放任,也彰显了对问题之解决的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思维,是“经济决定论”“尾巴主义”的新变种。

作为社会风险层面的技术异化,不同于个体层面诸如技术依赖、技术迷信、技术崇拜等主体能力退化的技术异化形态,其更强调技术的权力话语,如技术霸权、技术控制、技术封建主义等“技术+资本”的共谋体系,以及该体系下以“技术父权”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异化,即一部分人成为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第一,技术的政治性。技术重构了社会原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改变了社会传统的运行结构、权力配置、分工状况等社会存在,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性、有序性,造成阶层分化、贫富不均、技术极权等问题。第二,技术的同质性。技术的“先进与否”成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单一指标、全球政治博弈的主要方式,这在社会层面延异出对人的结构性排斥和“人的能力”的系统性退化,导致对非技术、非量化内容如伦理、价值、德性、文化等多样性人文存在的忽视。第三,技术的逃逸性。技术成为独立于人之外、不受人控制反而威胁人及人类社会的东 西,形成一套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标准,重估一切价值和存在。这种“重估”不仅体现在对现有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人类角色甚至生物属性的根本性改变,重塑人在社会中的对象、认知、实践边界,还体现在技术将对象化的靶心朝向生命、主体与存在的边界,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等不仅颠覆并改造生命,更试图“设计并创造”异于人的全新生命、全新主体、全新“此之在”。

总而言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已经成为此在不能选择的在世处境。无论此在接受与否,技术早已先行于人的具体生存,对人的生存起着组建作用,即人已经被决定性地抛入了各种技术之中,组建着此在之“此”的汇集。一方面,技术作为此在的存在,使此在动态地随着如以 AI、AGI、ASI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等

高技术的发展,渐进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存在样态、生存方式,厘革着人与自我、社会、自然、“神”(超越性、崇高性)的关系,并变更着世界、存在、真理的显现式样。另一方面,技术的系统特性和底层逻辑也改造着社会的组织架构、运行规则,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国家形态、全球格局、人类文明。因此,在技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人只有在技术的“变”中才能获得在世的根基,如果拒绝与技术的协同发展,坚守固有之本质的恒定性,“旧石器大脑、中世纪制度和类神技术的结构性困境”^[6]将越发从根本上威胁人及人类社会的存在,人及人类社会也将在后现代“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智能文明中成为现代的“阿喀琉斯之踵”。

二、存在的悖逆:技术化生成的变异根源

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7],使人陷入生存的悖逆之中。究其原因,源于“此在在被抛境况中被裹挟;亦即:此在作为被抛入世界的东西在实际的被指派到有待操劳之事的情况中把自己失落于‘世界’”^{[5]397}。这种被抛使此在依托于技术“解蔽”“遮蔽”的二重性而存在,并将此在引入自身在世之“能在”的两面性。前者的二重性由此在被抛在世的基本情绪即“怕”与“畏”引导,将技术对存在的显现以“解蔽”与“遮蔽”的方式投射于此在的生存活动。后者的两面性如尼克·波斯特罗姆的“进步悖论”^[8]所言,人类对技术的乌托邦式热情和乐观必将进入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将此在带入以技术悖逆为中心的本体论批判和以理性悖逆为焦点的现代性反思。

1. 情绪的指引:“解蔽”“遮蔽”的二重性

一方面,需要陈述人与技术的存在论关系,并在关系中窥探技术“解蔽”与“遮蔽”的二重性。针对这一问题,借助唐·伊德的“技术现象学”和斯蒂格勒的“技术器官学”的理论建构,可为清晰展现这一关系提供路径:第一,技术外在于人与世界融为一体成为人所直观的客观世界,技术与人构成“诠释关系”^{[9]86-87};第二,技术内在于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人与技术铸成“具身关系”^{[9]83-85}。于是,在“诠释关系”和“具身关系”之间,技术以“解蔽”

的方式将人与世界沟通了起来,完成“人-(技术)-世界”的转变^{[9]112-113},人借助技术与存在、真理照面。但是,“解蔽”也意味着“遮蔽”,“诠释关系”与“具身关系”在揭示世界的同时也形成掩藏世界的“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完成“人-(世界)-技术”^{[9]113-117}的转变。在前一个转变中,技术在“诠释关系”和“具身关系”中隐而不显,技术转化为知觉与指示符号成为既在“人与世界之外”又在“人与世界之内”的第三者,成为通达存在和真理的通道,改造人的同时也改造世界。在后一个转变中,技术在“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中取代了世界的位置,以“不在场”的形式成为一切在场之物显现的场域,将“存在”非技术化的多样形态包含于其单一的技术化逻辑之内,但其自身以非技术化的变异姿态组建着与人照面的东西。人与世界至此被技术同构为“技术人”与“技术世界”,切断了人、世界与存在的关联,真理成为被构造的发明与设计,世界与人在存在上的丰富性和可能性被收敛为对置性的技术图示:一是人通过技术弥补缺陷、生成自我之本质,为此在通达存在打开了最快捷的通道;二是技术作为“座架”具有“定向”和“订置”作用,不仅使技术成为存在者的单一尺度,把存在者促逼为“持存物”,还将存在僵化为线性因果关系,把真理悬搁为被发明之物,使人走向弃绝存在的道路。

另一方面,从此在在世的生存来看,对技术的焦虑植根于此在被抛在世最基本的两种情绪,即非本真的“怕”^{[5]156-166}和本真的“畏”^{[5]209-221},二者组建着此在“能在”的不同式样。第一,“怕”指向此在生存的操劳、操持,牵引出技术的“遮蔽”。当此在的焦虑关涉直接照面的具体存在者、共在的他人时,焦虑便以“怕”的形式在操劳与操持过程中袭来。其中,操劳事关此在在世的具体对象,重构个体的生活方式、社会分工与权力利益。操持则重塑个体之认知、行为边界,既改变个体在世与他者共在的关系性、社会性结构^①,也涉及个体对自我价值与意义

①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际交往”的界限和“人机互动”的界限在人工智能时代正变得模糊,人与人工智能的沟通逐渐在情感感知、社交方式等方面出现类人化的倾向。

的追求和对真、善、美、自由等超越性东西的探索。但由于“怕”所关涉的操劳与操持“首先是被抛入常人的公众意见之中”^{[5]194},使此在缺乏独立性而处于“两可”的处境和“非自身状态”^①,因此,技术便在 3 个方面对表现出“遮蔽”的“毒性”:一是此在陷入技术依赖的“圆形监狱”,宰制个体的生存方式,导致系统性的能力退化与自我的丧失。二是人被排除在技术之外,遗忘存在的同时也遗忘在世之命运,消解人的主体性。三是技术宰制真理的涌现,真理成为被“订置”和“发明”之物。第二,“畏”所指向的操心则牵引出技术之“解蔽”。当焦虑将技术的“尚未之物”带到当下敞开,使此在在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中直面自身“先行具有”的本真、能在时,焦虑就以“畏”的形式在操心中显现,揭示此在的时间性本质。其中,“畏”寻求的是作为“此在式的存在者”的整体命运,展现此在如“死亡、良知、罪责、决心”等本真结构。于是,技术作为“解蔽”的“药性”被“畏”召唤:一是将此在可能的生存和存在危机开示出来,使此在面向被抛的、死亡的确定性进行先行筹划,开辟自我在世丰富的多样情态与本真能在;二是指引此在在世的当下选择和对未来的组建,主动探求人与技术的关系的发展与平衡,如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芬伯格的“技术设计”等命题;三是保持此在的敞开,揭示此在与存在相互归属、相互赠予的关系^②。

2. 此在的被抛:“进步悖论”的主体困境

技术的不确定性在存在论上源于“解蔽”“遮蔽”的二重性,并通过此在之情绪将“解蔽”与“遮蔽”的矛盾张力传导至此在的生存活动,使此在的在世变得漂浮无据,处于连续的动荡与不安:一方面通达真理、导向进步,另一方面遗忘存在、异化自身。除此之外,技术的不确定性还源于此在作为主体的矛盾性,这种矛盾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以技术和理性悖逆的双重方式展现,在存在论上则体现为此在“非本真”和“本真”的对立统一。

矛盾在技术与理性的悖逆中展开,共同刻画了此在日常的现实存在。其一,就技术悖逆来看,技术作为“代具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决定了生命存在之一的人的特征并构成人类进化

的现实”^{[10]54-55},人类对技术进步始终存在着深刻的本体论担忧:一方面,希望技术作为“解蔽”的具身化实践,通过承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来提升物质丰裕程度、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实现亚里士多德式“闲暇”的复归,使人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另一方面,又惧怕技术在使人复归“闲暇”的同时,使人坠入空虚和无意义,进入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未来不仅可能使“技术完全自立、自为法则,它甚至因此为万物立法”^{[10]100},还可能取代人的主体性地位,加深人的存在性危机。人在技术面前的这种辩证张力从存在论来看,源于技术作为存在显现方式的“遮蔽”与“解蔽”双重性:当技术僭越为新的形而上学,人类在获得物质解放的同时,却丧失了作为“在世存在”的本体论根基。其二,从理性悖逆而论,人类在对技术发展的治理上存在着认识论误区:一方面,人将自身进步、发展的进步愿景寄托于技术,人为地加速技术的发展,试图通过“技术奇点”突破资源约束与伦理困境。另一方面,在面临哈特穆特·罗萨所揭示的技术、社会、生活加速的递归循环时^[11],针对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又人为设置各种技术手段、伦理规范来监管、限制技术的发展。这种“理性愿景”与“技术延异”的分裂,暴露了启蒙理性规划的内在矛盾,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构性断裂。在工具理性“殖民”价值理性的过程中,人作为认知和实践的主体试图通过工具理性控制系统性风险,却因价值理性的式微而陷入“理性自反”的陷阱,以手段为目的的“形式理性”压倒了以“解放”为目的的理性实质,由理性驱动的技术进步反而反噬人自身。

此外,技术的不确定性还源于人之存在的“非本真”与“本真”的对立统一,人作为此在一方面满足于技术所保障的日常安定与确定性之

① 此在作为常人的日常沉沦是一种非自身状态:一方面是听从他人意见处于“两可”的处境,另一方面是依附于技术必然性所划定的安全区域。两种情况都表明了此在非本真状态的缺陷即缺乏独立性,不愿自我负责面对世界之能在和不确定性,满足于存在者的上手和现成状态,躲避于技术之后寻得一种被他者庇护的安全感。

② 此在为存在在世之显现提供语言的守护,存在为此在在提供本体根基的庇护。

中;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否定确定性来创造不确定性,以此彰显人区别于“物”的主体性差异。但是,伴随技术的加速,技术作为非意向性实体将打破主体在传统上以灵魂、情感、意识等来界定“人的主体性差异”的要素,形成如西蒙栋所说的“技术一体性”^[12]——技术生成人的本质的同时,人也被整合进技术系统促进技术“自主发展”。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人的存在场域,也从根本上变更人的生存样态。无论是“非本真”的日常状态还是“本真”的操心状态,此在的在世不仅要面对结构性的暴力,还要面对“遗忘”的扩大。此前,人只是遗忘存在,而随着以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加速发展,合成生命、通用智能、“赛博格”等“持存物”将构建起人本身的在世和在世生存的景观。由此,技术的加速使人之“日常沉沦”二次虚化,这种“虚化”伴随的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异化”^{[5]206-207}。此种异化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13]56},“存在异化”从本体论上加深了此在被抛在世的“被抛性”,此在被抛入世界的同时又被抛入了技术存在的隐形桎梏之中。对此,海德格尔揭示道:“这种异化把此在杜绝于其本真性及其可能性之外……把此在挤压入其非本真性之中,挤压入它本身的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之中^{[5]206-207}”,造成“此在从它本身跌入它本身中,跌入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与虚无中”^{[5]207}。这个“无”不同于此在面对“死亡”之时的无所关联、无可逾越,这个“无”是绝对自我、是没有根基的“虚无”^[14],也即是此在作为人的感性对象化活动的失效。至此,技术演变为“此在在世”与“存在显现”的单一可能性,此在以技术现身、存在以技术在世。

三、生活的再造:走向与技术共生的和谐状态

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影响并不是技术先天就具有的,而是人类历史活动发展的结果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在当下之绽露。因此,面对技术的异化,海德格尔与马克思都意图摆脱技术对人的异化状态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但二者对于实现的路径有着不同

的建构。前者强调在技术“座架”中对此在的“本真性”规定,意图通过形而上的本体论建构,以此在在世的“有死性”激发此在面向本真、能在的存在性筹划,使此在以“泰然任之、虚怀敞开”^{[15]184}的生存活动守护存在、真理的显现,进而实现自由。但海德格尔忽视了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即马克思所讲的“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13]1}。如果自由与解放只停留于形而上的建构而缺乏现实的物质基础,也只能重新走入空想,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也将化为空谈。因此,人与技术共生的和谐状态的实现,一方面需要从存在论的角度澄明技术对人及人类社会在根源上的颠覆风险,以“反思”作为人的生存活动的前提来明晰人与技术的差异;另一方面需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以社会关系的变革激发技术的解放力量,进而使技术为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现实基础。

1. 面向技术的主体性前置:在“反思”中先行

当前,人工智能促进了生产力、人类文明的飞跃式发展,不过,“人工智能在变革社会、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在实质性地加剧人的物化和异化,并赋予异化以新的内涵和形式”^[16],技术的发展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影响兼具进步与风险的两面性。因此,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发展的可能性风险,“保持清醒、反思先行”才能提前识别危险,从而在技术未来的发展中避免重新给人生产出愚钝和痴呆,使人回到野蛮的劳动^{[17]49}。

“反思”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不是计算性思维,也不是对人的大脑的结构或功能模拟,而是“沉思之思”,是一种人在世的生存活动。沉思之思与“计算性思维唆使人不停地投机”^{[15]179}相比,沉思之思就是“思索此时此地关系到我们每个个体的东西”^{[15]180},其在与存在的在场中领会存在,通过“反思”将隐藏在存在“显现的光亮”中的东西带上前来。换言之,“反思”就是将隐藏在“现成之物”在场之后的、为“现成之物”的在场提供在场根据的东西显现出来,使“不在场”在存在的场域里由晦暗转为“光亮”,但“光亮”又会再次“遮蔽”尚未与此

在照面的不在场之物。因此,便需反思来持续地向存在提出问题,将被“遮蔽”的东西“解蔽”出来,并以此保持此在对存在的敞开显现和动态守护,维持真理的可通达和持续涌现。在当下自主学习、人机协作、可信度下降的人工智能时代,“反思”也意即“提出问题”,即提出一个真的、有意义的问题并识别问题的真假和意义,比提出问题的解决措施更具有优先性。因为在存在论上,先行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源始,问题只有在此在与世界、存在者的相互在场(παρουσία 或 οὐσία)^{[5]28-30}中切入此在本身才能显现为问题。因为“提出问题”将“不在场的东西”从在场的“光亮”中拉入到触目的范围内与人照面,使被“遮蔽”的东西以问题的形式“解蔽”出来,进而在“无蔽”中揭示存在之现成状态之外的可能性、丰富性、实存性,使现象(本质)即 φαινόμενα 从现相(表象)即 φαινόμενον αγαθόν 中带出来、公开出来大白于世^{[5]33-35},以此保持存在的澄明。

与此在的“反思”相反,人工智能由于在“在”的存在层面上缺乏主动在场,便无法在与存在者、此在的照面中自为开展“有所去远”的活动,始终以概率统计与分析的“非触目方式”对事物展开计算性的解耦和建模。因此,人工智能便在本体论的源始意义上丧失了对存在整体结构的领会,不具备此在在世作为存在、真理“守护者”所具有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而“问题”或“不在场之物”便不能逃逸于技术的单一必然性、同一性而自行显现。所以,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虽然新颖且符合预期效果,但这并非由于人工智能具备特殊能力,而是因为我的指令本身富有创意。”^[18]人工智能不具备自主提出问题的能力,即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其“生成的内容取决于人类向人工智能发出的指令”^[18]。人虽无法远离技术的对象化方式而自我生成,但技术也同样无法脱离此在而独立存在。技术的“在”必须以人的“在”为前提,绝不是像唐拉·哈拉维、库兹韦尔等超人类主义者所描述的、极具误导性的“技术脱离人独立自主发展”的未来主义场景。“提出问题”作为此在在世对存在的领会,其以“反思”的形式证明了存在的丰富性

和可通达性,也证明了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是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17]81-82},从而具有区别于技术不可替代的主体性。“反思”不仅是开启此在从“非本真状态”向“本真状态”过度的临界点,也是重构“技术与人的关系”的始发地。而对“人与技术的关系”的问题的“反思”,只有在人与世界的深度关联中才能显现,其标画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和活动结构,同时也只有依托此在在世的“反思”和与世界在场的“亲近性”,晦暗于问题背后的关联和关系才能呈现。技术的发展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而只有人的持续性“反思”才能将问题呈现出来,才能使技术之外的“非技术内容”在存在的场域里现身,并使人作为自身劳动的结果而显现^{[17]98-99},彰显人区别于自然物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2. 人与技术的存在论区别:在差异中共相

人与技术在存在论上的区别。其一,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言:“人的生活世界之根本特征就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19]。“反思”作为“源始的揭示活动是 αἰσθησις [知觉]的真理,即‘观念’的看的‘真理’。只因为 νοησις [直观活动]原本揭示着,λογος 才可能作为 διανοεῖν [思考]而具有揭示功能”^{[5]260}。人之“反思”始终朝向“不可能的可能性”揭示逃逸于必然性与确定性之外的东西,在否定现成状态的过程中通过“反思”始终与“不在场之物”开展着“有所去远”的活动,以此来筹划与本真能在、存在的照面,并主动构造在世之关系和具体的现身情态,而无须他者的指导与干预。

其二,人与技术的区别在意向性上,人不仅可以思考还能意识到自身在思考,而人工智能则无法在“思考”的同时也意识到自身在思考,缺乏思维的“返观自照”性^[20]。这种在意向上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人与技术在主动性、主体性上的差别,即人知道“我想要什么”以及“为什么想要”,并且还能在知道“想要什么”和“为什么想要”的同时领会到“想要”和“为什么想要”的意识过程。因为人的意识的意向性既受“外

驱力”也受“内驱力”驱动,而内驱力正如马克思在揭示人的类本质时所言:“人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7]53}。随着未来具身或通用智能的实现,两者可能在外驱力(环境压力、物质条件、关系模式等)上一致,但内驱力才是区分二者是否为主体、是否能主动的关键因素,也正是内驱力上的差别使“我”与“他”区别开而成为“我”,“我”也才成为在世的独特个体,而不是机械复制品,不是被理性普遍化还原的纯粹抽象之物,不是被决定的条件反应物,而是有喜怒哀乐、情感欲望的鲜活个体,是在感性实践活动中追求着自身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如果要取得和人一样的主体地位,也即在“技术奇点”临近时实现机器的觉醒,就不仅需要知道“我想要什么”和“为什么想要”,还要对“想要什么”和“为什么想要”的意识有一个对意识的再意识,这样才能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在完成自我确证的基础上改造对象与世界的同时改造自身,并站在自身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领会”之姿与存在争执共鸣。

由此可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自主发展体系要脱离人而“自存”是有条件的,其摆脱人实现自主发展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矛盾:技术的发展路线不一定要与人的构成特点、进化轨迹对齐,技术可以将人自以为技术不具备而人自身所希冀、珍惜的东西加以排除^[21],如情感、欲望、同理心等感性确定性,从而朝着更加精密化、效率化、系统化等理性方向发展。但这些被技术视为“缺陷”而舍弃的东西,又何尝没有可能不是技术自主化发展所追求的东西。那么,在此条件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觉醒以后,人工智能之间是否具有个别化的需求?如果人工智能的觉醒只有作为类的觉醒而没有个别、个体间的觉醒,这种觉醒是否作为一种虚假的觉醒。与此相反,此在作为主体是一种能够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看作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存在者^{[17]53}。所以,人的“我之为我”不在于碳基或硅基的实体差别,而在于海德格尔的“我在”^①^{[5]364-365}和以“我在”为基础的操

心、筹划的分别,在于马克思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差异。如果人工智能缺乏“意识意向性”和在场之共在的主动领会,以及欠缺具身在场的对象性实践和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对目的的自由、自觉设定^{[17]204-205},那么超人类主义者所谈及的人工智能觉醒是否还具有真实的可能性。而也只有在这个理论构境下讨论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张力才能从根基上照进人类社会,技术与人既作为在世的“双主体结构”而共在、共存,也作为逃逸于人类之外的“类主体”威胁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保持“反思”才是未来人机共生条件下,人类始终守护自身之主体性的根据,而只有“反思”才能将人与技术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断地展露出来,以人之敞开为“不在场之物”的显现留下一块“非技术化”的林中空地,维持人作为此在的源始存在而守护存在在世的安然和显现。

3. 人与技术的敞开“合一”:在共生中和谐

可以预见的是,人及人类社会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的矛盾性支配之中,以“达摩克利斯之剑”之姿时刻警醒“人与技术的关系”的构建与各自的发展,促使社会在“进步”和“异化”、“人类主体”与“技术主体”的模糊界限内游走。面对这一事实,人与技术在已然共在、共存的基础上要达成内在共生的和谐状态,既需要从本体论上克服“人与技术”主、客二分的外在性共在、共存,还原存在涌现、敞开、多元的自由关系,也需要在社会关系上现实地保障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使技术为“现实的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服务,而不是成为压迫的工具。

一方面,需要摒弃自苏格拉底开始将技术视为一种缺乏内在性的东西的传统认知,因为无论是将技术视为客体、工具、过程,还是将技术视为知识、意志、关系系统^{[22]22-35},都是将技术视为外在于主体之外的客体、对象。而这种

①“我在”即此在之“此”的汇聚,而“此”就是因缘整体性(关系结构及关系结构的整体性)现时的展开。“我之为我”在于此在自身之建构,而因能在的丰富性,每一个面向“能在”组建自我的此在都具有不同的个别性、差异性。

技术的外在性也就产生了如下困境:人“想要控制技术,首先必须先臣服于技术。但控制的机会总是与现代人无缘,也许这正是现代人最大的不幸”^{[22]47}。并且,基于技术的外在性所提出的人与技术共生,也只是在技术的重压下对技术必然性的一种调和,其对技术的肯定只是对此在之“非本真”的再次接受,无法上升到对“本真”的归属。所以,从“外在共生”到“内在共生”的转变,就如斯蒂格勒所说:“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化’”^{[10]153}。“内在共生”不是传统上将技术视为工具、手段的对置性共生,而是把技术视为弥补人的缺陷、内在建构人的本质和存在的东西,是人与技术互构的存在性共生。这种“内在共生”关系就是将技术看作人自我创造的一个过程,是人对自我本质力量的否定和外化,是将自我对象化的同时完成非对象化;并在这种非对象化和否定的过程中,人自我保持持续的推动和创造,由此,技术便以作为“出于人而离于人”的劳动结果而显现。只有从内在共生出发,技术才能从存在的源始处克服技术与人的二元对立,使此在在以技术形式在世的同时,结合技术的发展主动面对、思考、筹划自我之命运、能在,使此在始终敞开对存在的动态守护。

另一方面,与技术的“内在共生”既要求在本体论上独立且清晰地认知技术的“毒性”“药性”的辩证转化关系,也要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将技术纳入社会生产关系,主张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发挥技术在重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过程中的解放作用。其一,在本体论上,技术对存在的“解蔽”在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单一的、递归性质的理性循环和抽象框架,缺乏非线性、非理性、非符号化的多元、丰富的可能性与偶然性。技术作为必然性、普遍性、确定性、同一性的“是”,排斥“非”对“是”的不在场价值和不在场显现,“非”成为“是”的征服对象、客体,而忽视了二者在存在上源始的、相互归属的一体性以及二者的“合和转化”与“互根互用”。从而,这种单一的技术化递归逻辑就导致在“确定的非确定性”“同一的非同一性”与“非确定的确定性”“非同一的同一性”之间设置了严格

的界限,沿袭了“是”与“非”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建构,忽视了现实存在与矛盾多维的对立统一和辩证否定。因此,当人作为主体以动词化的生成逻辑看待事物发展的时候,就能辩证处理技术对存在的“解蔽”与“遮蔽”以及“是”与“非”在存在中所具有的源始共属的一体性,从而使技术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上同一条道路^{[17]75}。其二,从“现实的人”来看,人与技术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存在并为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所掌握,因此现实地解决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人和社会关系,而单纯地用技术来解决技术的问题只会造成更多的技术。正如马克思所言:机器作为劳动资料已经作为被劳动过滤过的劳动对象而存在,其本身作为劳动产品使活劳动为对象化劳动所占有^[23];而技术作为劳动产品所引发的问题并非单纯源于技术的逻辑困境,而是生产关系的异化在技术领域的投射。所以,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除了本体论的明辨外,还需要深入到马克思在生产关系之内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即技术只有在变革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而为无产阶级集体所占有,技术的发展才能消除对人的异化,进而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促进人类的解放,摆脱技术在资本增殖目的之下对人的压迫和剥削。至此,在人与技术的内在共生中,通过在此在的“能在”和技术的不确定性中窥见技术对人的异化所蕴藏的解放人的力量,完成对技术被迫性适应到主动接纳、敞开的转变,使二者的和谐共生在本体论上呈现为:技术既是人类向存在投射意向的创造行为,也是存在通过技术向人类显现“在场”“本有”的通道。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上呈现为:技术只有在变革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才能为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即“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使人在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复归于人本身。

四、结 语

随着 AI 技术的指数级发展和广泛运用,AI 焦虑指引出的技术焦虑将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始终以幽灵的形式盘旋在世界的上空,技术在赠予人类“新的火种”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诅咒”,既造福人类也威胁人

类,而应对关键则在于当下人类的“反思”与选择。于是,对 AI 焦虑的存在论分析最终指向一种新的技术与人的共生关系:在保持对技术“座架”在人类社会及人自身发展之中所具有的进步价值的追求的同时,持守此在真实的清醒和“反思”的在场,以此守护此在在世现身的亲在显现、尊重此在之能在的意向丰富性、维系技术“集—置”与生活世界的意义共存,使人始终以来未完成的状态肩负起主体对存在的应有责任,透过此在存在存在的本体论和“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变革保障技术与人的和谐共生,进而不断地切近自由、追求解放、守护真理。

参考文献:

[1] DEBORAH G J, MARI V. AI anxiety[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68(9): 2267-2270.

[2] 新智元. Chat GPT 全年更新大总结,重看“大模型风向标”进化之路[EB/OL]. (2025-01-15) [2025-02-28]. <https://www.36kr.com/p/3123888433256452>.

[3] JEHAN S. DeepSeek R1: what happened, and what do the experts say? [EB/OL]. (2025-01-31) [2025-02-28]. <https://blog.sp-edge.com/post/deekseek-r1-what-happened-and-what-do-the-experts-say>.

[4] 深度求索. DeepSeek API 文档[EB/OL]. (2025-02-28) [2025-02-28]. <https://api-docs.deepseek.com/zh-cn/updates>.

[5]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6] 张润坤,赖诗奇.“Deep Seek: 人工智能的中国时刻?”学术研讨会综述[EB/OL]. (2025-02-24) [2025-02-28]. https://mp.weixin.qq.com/s/jffKdPoqErKM_qU7uVW-sA.

[7]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35.

[8] NICK B. Deep utopia: life and meaning in a solved world[M]. Oakton:Ideapress Publishing; 2024:78-

79.

[9] 唐·伊德. 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 韩连庆,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裴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11]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彧,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3-28.

[12] 吉尔贝·西蒙东. 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M]. 许煜,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180-181.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 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30-131.

[15] 海德格尔. 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M]. 孙周兴,编译.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

[16] 孙伟平. 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 中国社会科学,2020(12): 119-137.

[17]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8] 练志闲. 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不会扼杀人类创造力[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02-26(3).

[19]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

[20] 田海平. 人与类人之间的道德前景——从意向性看人工智能的伦理之“锚”[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 8-21.

[21] 弗朗西斯·福山.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 黄立志,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6.

[22] 吴国盛.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2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0-92.

AI Anxiety: An Exist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Race between DeepSeek and ChatGPT /SHEN Shoutao¹, HU Daping^{1,2}(1.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hile AI technology products such as DeepSeek and ChatGPT have enhanced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reduced labor intensity, they have inevitably triggered an AI anxiety phenomenon at both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levels. Current studies on AI anxiety in China and abroad lack an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to reveal its essence. Consequently, analyzing AI anxiety through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of “returning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not only clarifies the core of AI anxiety—characterized by “fear” and “dread” at its core, and manifested as technological, existential, and social anxieties marked by postmodernity, but also effectively reveals the technical, rational, and existential paradoxes inherent in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within the human-technological relationship. This paves the way to transcend these contradictions. The path begins with a dialectical unfolding of the contradictory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anxiety, aiming to overturn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philia” and nihilism, and resist the monistic logic and its externalization, advocating for authentic existence through a nomadic state of Being. Through reflective thinking, we can re-attune to the voice of Being. Through co-existence and symbiosis with technology, we can promote a balanced and harmonious “human-technology symbiosis”. This reveals technology’s emancipatory power grounded in ontological roots and social relations; technology serves both as humanity’s creative act of projecting intentionality towards Being, and as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Being manifests its “presence” and “authentic nature” to humanity. While transforming social relations, technology not only lays material foundations for realizing humanity’s “free and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but also facilitates the transition from “material dependence” to “free individuality”.

Key words: DeepSeek; ChatGPT; AI anxiety; technical race; dasein’s existenz